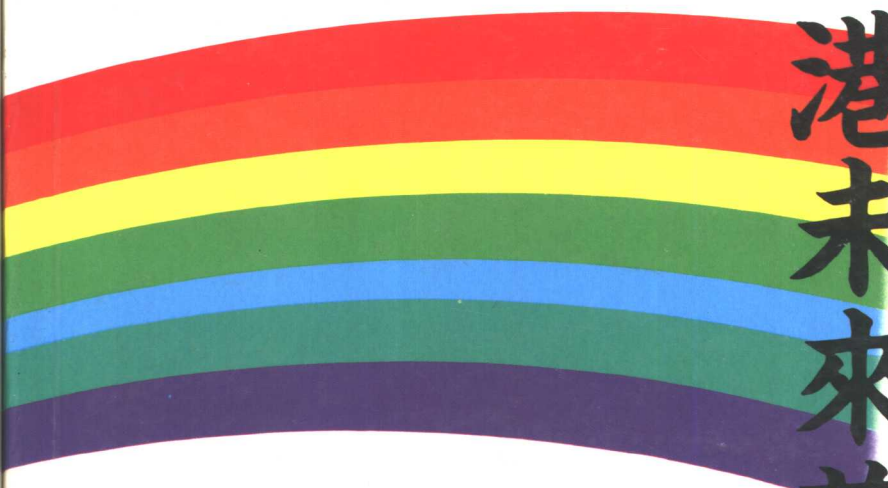


香港未來藍圖



司徒蕙芬
盧少卿等著

廣角鏡出版



香港未來藍圖

司徒蕙芬、盧少卿等著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書名：香港未來藍圖

著者：司徒蕙芬、盧少卿等

出版：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Wide Angle Press Ltd.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八樓 電話：5-753877

圖文傳真機：(852) 5-8381079

195-197, Johnston Rd., 7/F. Wanchai, Hong Kong.

Fax：(852) 5-8381079

發行：華風書局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七樓 電話：5-749495

承印：友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88年5月初版

定價：港幣35元

書號：ISBN 962-226-235-X

目 錄

經濟透視

- 3 司徒蕙芬／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檢討
- 21 王高揚／港粵合作迎擊經濟對手
- 35 王高揚／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經濟合作前景
- 49 司徒蕙芬／1988年世界經濟總檢閱
- 75 司徒蕙芬／中共與台灣的「地下合作」

政治透視

- 99 梁桂山／香港未來的政制新藍圖
- 115 盧少卿／史無前例的非殖化
- 133 梁桂山／「李後風波」的來龍去脈
- 155 梁德／評《代議政制綠皮書》
- 171 司徒蕙芬／新中產階級的崛起
- 195 梁德／預卜1988年直選前途

經濟透視

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 檢討

司徒蕙芬

中國對外開放取得了顯著成績，在過去五年間，中國經濟每年平均以10.7%的速度增長，令舉世矚目。

但是，中國產業結構失衡，資金積累率下降，市民抱怨食品價格飛漲，中國面臨着種種的困難和挑戰，「國際大循環」理論由此應運而生，認為通過沿海地區同國際市場交換，可以帶動中國中部、西部發展，可以解決重工業發展資金。

討論「國際大循環」理論，必然要聯繫到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聯繫到經濟建設同改革的關係，範圍相當廣泛。

經叔平贏得了掌聲

在中國七屆政協大會上，全國工商聯常委，中國

國際經濟諮詢公司副董事長經叔平對中國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提出質疑，贏得了與會政協委員們的掌聲！

經叔平批評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目標不清，「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有危險，會使中國經濟發展掌握在他人手中，弄得不好，反而害了自己。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目標應該是：「立足國內，面向世界，利用兩種資源，利用兩個市場」；中國對外開放的首要目的，是爲了發展國民經濟，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廣大人民生活水平；中國在參與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過程中，不能照搬亞洲四小龍的程式，引進外資不應處於被動狀態，應該有全局觀念和制訂整體規劃。

經叔平的發言，反映了中共政治局88年2月初正式通過推行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以及李鵬代表國務院向人大會議提交報告之後，中外學者仍然議論紛紛，例如中國經濟專家陶大鏞、吳家楹，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閔建蜀等等都發表了不同的意見。「國際大循環」理論確實值得深入探討。

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由來

中國《經濟日報》於88年3月29日發表了一篇文章，謂「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不等於「國際大循環」理論，前者是政府的決策，後者是經濟理論界的學術觀點，尚屬理論探討，二者不可等同。香港《信報》88年4月2日刊登前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周八駿的文章，詳細論述了「國際大循環」理論同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有六點相異之處；但作者亦承認，

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是以中國國家計劃委員會年輕的副研究員王建提出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構想作為理論依據，「這種說法誠然是有一定的道理」。

事實根據是有的：《經濟日報》曾於88年1月5日刊登記者李德來的一篇文章，名為《記加入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在文章內詳細介紹了中共十三大進行期間，「國家計委最年輕的副研究員王建寫的關於走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送到了紫陽同志案頭。沒過幾天，趙紫陽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提出了這一新構想，並加了一句帶有商量口氣的評語：我看是有道理的」。文章接着介紹：「十三大剛剛閉幕，趙紫陽總書記赴江西、浙江、江蘇視察，……經濟發展戰略的新構想在新上任的總書記腦子中悄悄醞釀」了。如果《經濟日報》記者的報導沒有「保水」，王建有關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構想，是在中共十三大期間提交給中國領導人，並被中國領導人認為是有道理的。

查證中共十三大報告，有關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戰略，當時只着重提出要正確選擇出口戰略和利用外資戰略，即「必須根據國際市場的需要和我國的優勢，積極發展具有競爭力、見效快、效益高的出口產業和產品，大力提高商品的質量，合理安排出口商品結構，多方位地開拓國際市場，以爭取出口貿易較快地持續增長」。同時也提到要「發展勞務出口和技術出口，努力增加非貿易外匯收入」；對於國外資金的利用，「要根據償還能力和國內資金，物資配套能力，保持適當的規模和合理結構，大力提高外資使用的綜合經濟效益」。對於經濟特區、開放城市和地區的開發與建設規劃，要「着重發展外向型經濟，積極開展

同內地的橫向經濟結合，以充分發揮它們在對外開放中的基地和窗口作用」。

以上可見，在中共十三大報告裏，還沒有提出把沿海地區經濟發展作為一項戰略決策，是王建提出「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之後，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才形成為一項戰略決策的。正由於這項重大戰略決策醞釀時間短，沒有在中國經濟界人士、學者中展開討論，決策之後，人們議論紛紛是可以想像的。

「國際大循環」理論的模式

王建88年1月5日在《經濟日報》上發表了「選擇正確的長期發展戰略」，即關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一文，3月28日又為答覆各方面提出的質疑，在《世界經濟導報》發表了《關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幾個問題》一文。這兩篇文章的理論觀點，構成如下模式：

(一)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是一個相對發達的重工業和低度發達農業的「特殊的二元化產業結構」。以重加工組裝業為主導的產業，30年來增長了24倍，而農業增長只有2倍。現在，「農村人口工業化」，已經有了9000萬人向非農業轉移，預測到本世紀末，還會有1.8億農民向非農業轉移。這就需要大量資金，而重工業是資金、技術密集產業，「重工業走向高級化」，更需要有大量資金支持；農村人口工業化與重工業高級化爭奪資金。

(二)大量資金如何積累？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積累率降到歷史上最低水平，支持積累率回升的基本因素是依靠外債積累；但消費率不斷上升，再過幾

年，中國面臨外債還本付息高峯期，外債將從淨流入轉為淨流出，實際用在生產發展的資金會受到緊縮甚至會逆轉。正因為如此，「立足於國內循環是很難解決這個矛盾的」。

(三)「長期以來，僵化的、排斥市場的經濟體制，使企業缺乏活力，因而微觀經濟效益降下，加劇了這個矛盾」。

(四)怎樣解決中國資金積累矛盾，使中國走上「現代化工業強國的道路」呢？中國必須選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首先把「沿海趕下海」去。

王建還指出，這種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是「從現在到本世紀末或者更長一段時間內的總體發展戰略」。

實現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具體步驟是這樣：「今天在沿海實施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也可以說是中國走上外向加工型」經濟的第一階段，「把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過程融入國際大循環」，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一方面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路，一方面「可以從國際市場得到外匯。外匯可以代表一切資源的供給，有了外匯，我們就可以從國際市場上購買回重工業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密集型產品，重工業得到改造」。「從而通過國際市場的轉換機制」，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為矛盾的解決提供轉化條件。

國際大循環戰略實施的第一階段，重點擺在條件較好的沿海地區。在這一階段裏，暫時犧牲重工業自身的發展，加強國內尤其是內地的交通運輸建設，為出口產業向中、西部擴展創造條件。過5年到7年之後，「內地產品開始走向國際市場，勞動密集型產品創匯能力增強，可以用大部分外匯支持基礎工業及基

礎設施的發展」。

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理論的模式就是這樣。

珠江三角洲經驗的特殊性

現在要問：珠江三角洲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經驗，是否能夠解決王建講的可以取得重工業發展的資金和技術呢？是否可以通過「國際市場的轉換機制」，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資金積累問題呢？珠江三角洲引進外資的經驗，中國沿海地區284個縣是否可以普遍採用呢？

珠江三角洲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特殊條件之一是靠近香港。據廣東省經貿委員會調查，1985年簽訂的來料加工合同中，97.8%來自香港，1986年更是100%來自香港。香港本來就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擁有海外銷售市場，但香港勞工進入質變階段，工人收入達到相當水平，很多人不願意投身製造業，對超時加班工作有很大抗拒。就在勞工短缺，加上美元貶值，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激烈在這情況下，香港企業家主動尋求解決辦法，紛紛湧到珠江三角洲進行來料加工、裝配，或少數合資辦廠，在香港則保留關鍵性工序、財務管理、市場推廣和品質控制等，把主動權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上；有產地來源證限制的產品和高價產品，則留在香港生產，以便抵抗美、歐市場可能掀起的保護主義。

珠江三角洲發展外向型經濟另一個特殊條件，是主要發展來料加工、裝配工業。「三資」企業需要較完善的投資環境和配套資金，發展規模受到限制。據《廣東省對外經貿》1987年第4期介紹，從1979年到1987年

7月止，廣東省對外加工裝配簽訂的合同達72183宗，實際利用外資6.14億美元，銀行結匯工繳費14.54億美元；以1987年計，全省實收工繳費達3.5億美元，工繳費的收入頗為可觀。但問題是，工繳費的收入相對於勞動力的投入和基礎設施的開發費用，基本上比成本多一點點，屬於低盈利經營，一般只佔產品勞動附加值的10%到15%。

珠江三角洲各地區爲了使工繳費收入變得有利可圖，都到邊遠山區或外省招聘比本地更廉價的勞工從事生產。以東莞市爲例，外地流入的勞動力約30萬人，佔本市自有勞動力69.7萬人的43%。還有的地區，爲了抵銷成本支出的增長，利用牌價外匯同議價外匯、黑市外匯的差距，換取比牌價更高的人民幣去支付工資或其他成本開支，從而再不斷衝擊着人民幣匯率。因此，珠江三角洲各地收入的工繳費，能夠作爲資金積累上交到中央財政部的，實在是微乎其微。

當然要肯定，珠江三角洲發展加工、裝配工業上，確實有力地推動了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利用了上100萬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引進了大量先進設備、技術和管理經驗，擴大了出口，推動了鄉鎮企業的發展，形成了新的生產能力，有的勞動密集型加工裝配工業開始向「三資」企業過渡。但是，珠江三角洲發展外向型經濟的負面因素也是不容忽視的。這包括：

(一)加工裝配業有很大依附性，是利用香港外商現成的銷售渠道，「被動式出口」，自己無法最終控制國際市場。被動式出口容易遭受打擊，更嚴重的問題在於這種低級的外向型經濟，不可能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

(二)借國家給予的優惠條件，同內地工業競爭。比如

佛山市發展外向型紡織品，是用議價收購江蘇、陝西的棉花、紡紗、壞布加工出口，拉開了中國原材料官價與議價的差距，對內地原材料價格造成衝擊。在產品銷售方面，珠江三角洲生產的高檔次、新款式消費品，源源不斷打入內地市場賺人民幣；人民幣回流到經濟特區後，又轉換成議價或黑市外匯；其結果，排擠了內地工業，並引起外匯外流。

珠江三角洲不少企業家，口頭上講的是發展「外向型」經濟，實際上做的是發展「內向型」經濟。因為打入內地市場比外銷賺錢多，利之所在，趨之若鶩。王建文章裡講的「把沿海趕下海」，緩解沿海與內地的「地區二元化」矛盾，其實，在中國允許商品市場有更大自由化情況下，沿海發展外向型工業，也有可能損及內地工業，損及上海市這一類以內地為市場的沿海傳統工業。沿海地區外向型工業的「社會機會成本」相當高，這是一種隱憂。

機遇與挑戰同在，希望與困難並存

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李鵬已列為未來政府十大任務之一，成了必須執行的政策措施。沿海地區的領導人會不會頭腦發熱，浪費國家資源呢？

前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在人大小組會上發言，強調實施沿海發展戰略，既要看到有利條件，也要看到困難；既要有緊迫感，不失時機大膽幹，又要保持清醒頭腦，審慎從事，量力而行，切忌一哄而起，這是比較穩妥的設想。大概中國領導人已逐漸察覺到「國際大循環」理論不夠成熟，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姚依林在198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計劃報告中，對各地如何執行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強調它的目的性在於「必須把出口創匯抓上去」，具體執行時，「必須對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有緊迫感，同時，也必須從現實可能出發，有計劃有步驟地向前推進，不能不顧條件一哄而起」，防止「盲目鋪攤子」的現象發生。

《人民日報》也發表了評論文章，說「機遇與挑戰同在，希望與困難並存」。「機遇」到底有多大？困難是甚麼？確實要作冷靜分析。

從中國內部條件講：實現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首先得花一大筆錢去改善投資環境，這筆錢不是一個小數目。據深圳市1987年底統計，每平方米土地開發成本，包括平整土地、通水、通電、通訊、通路、排洪、排污等所謂「六通一平」，還不包括社會配套服務的醫院、學校、文化設施等建設，大約需要190元人民幣；每平方米標準廠房的建築成本，大約需要310元人民幣。沿海地區如果齊齊鋪攤子，就有可能消耗掉當前中國為保證農業生產持續穩定增長，為增加社會供給所必須投入的資金，增大通貨膨脹的壓力。

從外部條件講：所謂世界性勞動密集產品轉移「機遇」，沿海地區不一定能夠「遇」得上。

進入1988年，世界經濟發展放緩，已是定局。美國從84年起即轉為負債國，近年出現的巨額財政赤字和外貿逆差，已到極限；今後必須增加出口，進口則可能萎縮，美國經濟已帶動不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世界貿易市場容量也只能按4%左右增長，已有的一系列國際貿易協定和關稅保護，尤其是對付紡織品的嚴格配額限制，不會有多大的變化。王建預計中國勞力

密產品每年按12%增長，到2000年，中國將有1500億美元勞動密集產品外銷，賺取大量外匯。實現王建的戰略意圖，其難其巨，可想而知。

進入1988年，亞洲四小龍經濟增長亦將放緩。據聯合國地區機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及社會委員會估計，亞太區38個國家和地區的增長會下降至5.6%，四小龍的出口增長放緩，尤為明顯。四小龍在美國經濟放緩、美元匯率下跌壓力下，積極開闢新市場，南韓不惜修正對中國的政治取向，台灣更冷卻政治爭論，最終目的還是要打入中國潛在的大市場。四小龍目前經濟發展水平，基本上以出口勞動密集產品為經濟導向，即使南韓、台灣，也僅僅是開始向技術密集產品轉型，他們對中國沿海地區轉移資金、技術是有限的。

進入1988年，日本對台灣的投資將超過對中國的投資。據大藏省統計，從85年開始，日本對台灣投資額為1.1億美元，對大陸為1億美元；1986年4月到87年3月，對台投資為2.9億美元，對大陸投資為2.2億美元；日本資金投到泰國的也越來越多。

進入1988年，香港對泰國的貿易可能發展，1987年港泰貿易額已增至76億港元，港商已投資44個工業項目。港商到馬來西亞投資的也增至200多家，22億港元；因為他們提供廉價勞動力，豁免利得稅；在泰國設廠，還可以用「東協國會員」身分，免稅輸出產品到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從泰國出口紡織品的限額，尚未受到太大的限制。

主要矛盾是產業結構失衡

王建的「國際大循環」理論，最大缺陷是對中國經濟「特殊的二元化產業結構」，停止在靜態分析層面，沒有從縱向去分析二元化產業結構，亦即中國經濟理論常講的「違反按比例發展規律」的歷史背景。因此，王建不理解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應該立足於依靠中國自己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同時也應堅持對外開放，來取得高速度的增長。王建經濟理論的模式，是建立在既不了解國際市場環境，也不深入分析中國經濟環境的基礎上，毛病就出在脫離實際。

中國三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如同王建講的，是「受蘇聯模式中『生產資優先增長』理論的影響」，重工業過分超前，重工業與農業之間的產業結構失衡；在重工業內部，加工工業同基礎工業、原材料工業之間也失衡，形成了中國產業結構的「特殊二元化」。在過去的年代裡，中國過分強調「國外敵對關係的長期存在」，把相當大的一部分資金積累用於軍事工業，準備「打大仗」；又花了差不多整個五年計劃積累的資金投入內陸山區進行「三綫」建設，更加劇了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失衡。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需要尋找出一條衝破貧窮落後的道路。在國民收入低，生產力發展差，資金積累少的困擾下，不可能進行全面性的投資，因而採取政府干預政策，首先把資金大部分注入重要的製造業，加意催谷，使他成為帶動其他相應部門增長的「火車頭」；與此同時，要求國民勒緊腰帶，忍受生活上的困難。這種最强烈的凱恩斯經濟方式，未嘗不是貧窮落後國家經濟「起飛」的一種辦法。中國在第一個